

認同問題：臺灣與比利時的比較

Identity Problem: Comparison between Taiwan and Belgium

湯紹成 博士

政治大學國關中心副研究員

提 要

臺灣的政治認同經歷了許多轉折，從日據時代開始，經過辛亥革命、抗日戰爭以及國共內戰與白色恐怖等等，這使得在臺灣的五大族群的認同差異甚大，但臺灣人民原生因素的共性甚大，建構因素也不小，因而並未造成重大的族群分裂與衝突。目前，兩岸關係的發展，也對於臺灣的政治認同產生一些影響。

比利時的情況不同，比國是周邊大國的競技場，也因大國權力的運作組成國家，由於原生因素差異甚大，其中尤以語言為甚，再加上日益增大的經濟差異，可能導致分裂的結果。就算如此，基於比國的民主根基，分裂也將會是和平協商的過程，這也與兩岸的情況差異甚大。

關鍵詞：政治認同、原生因素、建構因素

Abstract

Taiwan's political identity has undergone various changes. It starts from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hrough the 1911 Revolution, Sino-Japanese War, the civil war and the White Terror until the current democratic era. The result is the varied identities of the five of Taiwan's ethnic groups. Taiwanese people share a great sense common primordial factor and a solid foundation of constructive factors, serious ethnic divisions and conflicts did not occur. At the moment,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the current cross-strait relations, also exerted some effects on Taiwan's national identity.

In comparison, Belgium's situation is different. It neighbors severed major European powers, and was founded on the ground of their compromises. But regarding primary factor, the differences are great, especially in their national language. This could lead to the current split between the two ethnic groups when economic differences become divergent. Even so, based on their deep democratic roots, the possible division will be the outcome of peaceful negotiations. This perhaps makes the biggest difference when comparing Belgium to Taiwan's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Keywords: Political identity, primordial factor, constructive factor

壹、前 言

在世界各地，許多國家都是由不同的民族或族群所組成，或者一個民族或族群分散

在幾個國家之中。國父孫中山曾提出五族共和的政策，而漢族在中國則佔據絕對多數的優勢地位，但回族、藏族與漢族爆發衝突的事例，亦時有所聞。在東南亞的華僑，則

在各該旅居國佔據相當重要的經濟或政治地位，有與當地族群和睦相處的範例，比如泰國與新加坡，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但在印尼也不時爆發排華的暴動，造成重大的損失。此外，猶太人幾千年來沒有國家，曾經遭受各國的凌辱，尤其是德國的希特勒，但當前猶太人在美國卻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不容忽視。由此可見，族群的融合對於各該國家的發展極為重要，家和萬事興、和氣生財，否則族群對立可能爆發衝突，兩敗俱傷。

兩岸一水之隔，同文同種。但是，在過去的幾百年來，由於國家歷盡滄桑，因而使得臺灣的認同問題出現了極大的轉折與變化。在歐洲，雖然自1648年西伐利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以來，各國大都有已4、5百年民族國家的歷史經驗，^{註一}但是，當地的族群衝突，還是時常可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愛爾蘭問題與西班牙的巴斯克(Basque)問題等等。相對的，在族群衝突之後能夠形成和解，並建立一套和平共存模式的典範之一，就要屬西歐小國比利時，但目前的情況也可能會有所改變。

本文先從一般的政治認同著手，以便確認臺比兩國在認同問題中的特質，此乃宏觀的檢視。然後，再以兩國幾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以及當前的情況，來探究其政治認同問題的特色，也就是從兩國內部的發展來探討，此乃微觀的視角，兩者相輔相成，以期

完整。最後，再將臺灣與比利時兩個實例相互對照，以便我方可以吸取相關的經驗。

在研究的方法方面，由本文的題目可知，此乃一個比較的研究，因此，作者採Todd Landman的比較研究法(comparative analysis)為分析的主軸^{註二}，期藉由比較分析相關實例的背景敘述(contextual description)，再加以分類(classification)與假說測試(hypothesis-testing)，以及預測(prediction)未來發展等步驟，來闡明臺灣與比利時之間的差異。

此外，再配合作者自行研發的所謂座標研究法(coordinate approach)，來貫穿上述兩大部分。此乃藉由數學座標中縱座標與橫座標的架構，來給於相關研究課題以縱切面(vertical section, or longitudinal section)與橫切面(transverse section, or latitude section)的方式來予以對照分析。易言之，所謂縱切面，就是從課題的歷史發展脈絡中去找尋其當前情勢的生成原因與影響，比如臺比兩國認同問題的歷史生成原因；而橫切面，則是基於此依歷史脈絡，而確認當前在認同問題上的差異。

貳、研究的標的

其實，所謂的認同問題(identity)，乃產生於一種感受(sense)與認知(perception)。^{註三}由於認同的範圍十分廣泛，必須要有範疇與層次之分，以及主體與客體之別。比如人類學、社會學與心理學等，都有極為深刻的研究與分析，^{註四}但本文首先只侷限於探討臺灣

註一 德國在1871年才統一，乃一例外。

註二 Todd Landman, *Issues and Method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5-10.

註三 Jenkins, Richard, *Social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1996); Craib, Ian, *Experiencing Identity* (London: Sage, 1998); Leary, M. R.; Tangney, J. P., *Handbook of self and identit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3).

註四 Cote, James E./Levine, Charles, *Identity Formation, Agency, and Culture*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2). Styer, Sheldon/ Burke Peter J.,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an Identity Theor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3 (4): 284-297.

政治認同(political identity)的問題。^{註五}

再以認同的層次觀之，臺灣位居東亞地區，臺灣人被認定或自認為是亞洲人，絕無疑義。但是，由於兩岸分離，臺灣人是否是中國人，則爭議甚大。^{註六}至於基隆人與高雄人都是臺灣人，則也無問題，但若高雄人有意獨立，那將產生高雄人是否是臺灣人的爭議。由此可知，在認同問題上層次的差異極大。

至於認同的主體部分，本文前半將以臺灣的幾個層面為重，比如一般民眾、知識份子與政黨等，而認同的客體則以國家、民族與族群為主。再以政治認同的客體內涵觀之，其中國家的界定比較清楚，一般而言依照國際公法就可確認，^{註七}只是因為兩岸自日據時代以來的分離，以及大陸情勢的變遷，狀況特殊。還有，自 1949 年以來至今，兩岸的內戰狀態並未完全結束，雙方在雙邊關係方面也必須有一些特別的安排。再加上本土勢力的興起，挑戰既有的國家與民族認同，也使得臺灣的政治認同問題也變得相對複雜。

位於西歐的小國比利時王國(Kingdom of Belgium)，面積 3 萬 2,000 平方公里，與臺灣相當，人口 1,200 萬，只佔臺灣的一半，獨立於 1830 年。^{註八}該國的命運多舛，兩千年以來，曾受到羅馬帝國、法蘭克人、西班牙人、日爾曼人以及荷蘭人等的佔領與治理，

也還在 15 至 18 世紀成為歐洲各大強權的戰場。基於歷史的原因，在宗教方面，比國 80% 人口信奉天主教，所以宗教並不構成該國內部的對立因素。相對的，語言則成為比利時最為關鍵的族群區分標誌，因而使得比國嚴格按照語言來劃分行政區，此乃比利時語言政策與國家政策的一個重點。^{註九}

當拿破崙在 18 世紀末權力擴張之際，曾經佔領比利時約 20 年之久，並曾將法語定為官方語言。當時，由於法國的強勢地位，以及法語早就是歐洲皇室以及外交方面的通用語言，而比國南部以煤鐵業為主的瓦隆人(Walloons)，其工業化的程度比較高，原本就受到法國的影響而操法語，該項政策對於他們而言不成問題。

但是，對比國北部的法蘭斯德族群(Flanders)而言，其中還包括布魯塞爾地區，其影響就很大了。這主要由於該地區以農業為主，其民性較為保守，內外的交往與連繫均比較少，且法蘭斯德語(Flemish，為方便起見後簡稱荷語)乃屬於日爾曼語系，與當今的荷蘭語極為類似，亦可說是荷蘭語的一種方言，因而在接受法語方面的障礙比較大。可是，在法國佔領期間，該地區的知識份子與資產階級等社會上層人士，則因積極使用法語而抬高了他們的社會地位，形成了他們與中下階層平民百姓之間的隔閡。^{註十}

^{註五} Norton, Anne, *Reflections on political identit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Jonathan Friedman, *Myth, history, and political identity*, *Cultural Anthropology*, 1992, pp.194-210.

^{註六} 見本文圖 2，頁 14。

^{註七} Ipsen, Knut, *Völkerrecht* (München: C.H. Beck Verlag, 1990): 227-345.

^{註八} *History of Belgium*, <http://www.visitbelgium.com/bxhis01.htm>.

^{註九} 比利時還有一個德語區，但因人數不及 1%，故從略，但可見網站：<http://www.dglive.be/desktopdefault.aspx>; Marie McAndrew, *Ethnic relations and Education in divided Societies: Belgium, Catalonia, Northern Ireland, Quebec*, www.ulster.ac.uk/faculty/shse/unesco/html/mcandrew%20papers/Leman.

^{註十} 廖立文，比利時語族文化共同體與行政自治區之演變與現況，mail.tku.edu.tw/cfshih/ln/paper16.htm.



參、宏觀的視角

檢視世界民族發展的事例可知，有些情況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先於政治認同(中、德、義、法等國)，因為這種認同多半是在自然生活或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形成，因而，文化認同多可成為政治認同的基礎，兩者的內容實難以分割。^{註土}但是，也有一些情況是政治認同先於文化認同(如英國、瑞士、前南斯拉夫與新加坡)，此乃因政治認同的目標突顯，而使得文化認同的地位居次所

致。這些事例亦可證明，雖無整體的文化認同，政治認同還是可以建立。

一般而言，民族的內涵則因各自生成的背景不一而相異。比如一群具有共同種族、語言、文字、血統、宗教、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人民，或只具有其中若干因素的群體，先形成族群或族裔(ethnic group)，此乃一個國家或民族內的先期發展階段，或組成民族或國家後其內部的次級團體。易言之，民族還可分為主體民族(narodi)與非主體民族(narodnosti)，比如猶太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在以色列的猶太人是主體民族，此外那就可稱為非主體民族或族群與族裔，此乃與內地漢族與少數民族的情況相似。^{註土}

其實，上述這些民族組成的因素，都是可以個別客觀認定以及相互區隔，不論這些因素是真實的還是想像的，^{註土}此乃可稱為民族組成與認同的原生因素(primordial factors)。^{註西}但由於各民族的發展歷程不同，因而個別因素的重要性各異，或根本不是組成的要素。比如宗教對於猶太人與穆斯林就絕對重

^{註土} Hall, S., & Du Gay, P.,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age 1996).其中中、德、意等國比較明顯是由文化認同而產生政治認同，但英法等國則比較有爭議。有學者主張法國乃先產生政治認同再產生文化認同，見 Eric J.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0)。其實此與筆者的主張不衝突，因為若無個別的文化認同，政治勢力也無法創造統一的文化認同，其中捷克斯洛伐克就是極佳的例證。湯紹成，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的歷史背景，問題與研究，第 32 卷，第 5 期，民國 82 年 5 月，頁 52-59；Pynsent, Robert B., Question of Identity. Czech and Slovak Ideas of Nationality and Personality (Budapest, London,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4).

^{註土} 此一分法起源於前南斯拉夫，由於該國種族甚多，其中主體民族包括：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與穆斯林人等，而非主體民族乃指以南國鄰邦為祖國的民族成員，比如：阿爾巴尼亞人、保加利亞人與捷克人等。湯紹成，南斯拉夫的分裂與民族問題，問題與研究，第 33 卷，第四期，民國 83 年 4 月，頁 97-107。

^{註土}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1991).

^{註西} Jean-François Bayart, The illus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Translated by Steven Rendall, Janet Roitman, Cynthia Schoch, and Jonathan Derrick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o-published with C. Hurst & Co. 2005)；施正鋒，臺灣教科書中的國家認同——以國民小學社會課本為考察的重心，《歷史意識與歷史教科書論文集》(板橋：稻鄉，2003)。

要，而新加坡人則必須以英語來相互溝通，成為組成國家的基本要件，而以英語為母語的人民，卻各自居於不同的國家。

一般而言，在民族的生成過程中，經由互助合作或外部威脅等共同的歷史經驗，而產生具有內聚力的歸屬感(Zusammengehörigkeitsgefühl, communal spirit)，^{註五}此乃一種血濃於水以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we vs.they)的感知(consciousness)，也是一種休戚相關的感覺(feeling of solidarity)，以及共同一致的感受(common spirit)或是團隊精神(team spirit)。

進而，群體形成持續生活在一起的意願，其中還包括自願（新加坡各族裔）、半推半就（比利時的瓦龍人與佛蘭德人）與被強迫（西班牙的巴斯克人）等狀況，因而形成命運共同體(Schicksalsgemeinschaft, companions in fate)^{註六}，此乃可稱為國家與民族認同的建構因素(constructive factors)。^{註七}易言之，內部意願與外部環境，則可能是決定的因素。

比如一些國家之間的原生因素相同，但

意願不高或外在條件不配合，則也只能各自為政（中東阿拉伯國家與東歐斯拉夫民族國家）。相對的，就算原生因素不同，但是共同生活的意願強烈，甚至還可能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仍就可以組成意志的民族(Willensnation, nation of will)或國家（瑞士與新加坡）。法國著名哲學家 Ernest Renan，早在百餘年前就將民族定義為每天都要舉行的公投(plébiscite de tous les jours)，就是強調人民意願的重要性。^{註八}

另外，族群與族群之間可能在原生因素與建構因素方面各有相當的異性，形成族群間相互區分的標準。比如新加坡的華人、印度人與馬來人，其實他們在原生因素方面的共性甚少，不論是語言、文字、血統與宗教等等皆相異，可是其建構因素則甚強，其中尤其共生的意願強烈，因而組成國家。^{註九}印尼的情況則相差很大，佔人口 3%的華人族裔掌控 70%以上該國經濟，但華人與印尼人在原生因素方面幾無交集，而在建構因素方面又十

^{註五} 筆者認為德文 Zusammengehörigkeitsgefühl 一字最能表達歸屬感之意，其字面翻譯是 together, belonging, feeling。http://www.dict.cc/german-english/Zusammengeh%C3%B6rigkeitsgef%C3%BChl.html.

^{註六} 以一用語出自納粹德國時期，意在強調內部團結。近年，李登輝也曾採用，以代替臺獨。近來，大陸學者也曾採用，以代替統一。Hudal, Alois, Die Grundlag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Eine ideen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 Leipzig, Wien, Johannes G?nther Verlag 1937, Reprint Bremen, Faksimile-Verlag 1982.命運共同體，http://www.newtaiwan.com.tw/bulletinview.jsp?bulletinid=91050；命運共同體：大陸對臺戰略重構，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9/2/6/3/100926311_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926311&mdate=0409093042.

^{註七} Schulz,Eberhard, Die deutsche Nation in Europa ,Bonn: Europa Union Verlag GMBH,1982, pp. 37-58; Otto Bauer, The Nation, Gopal Balakrishnan (ed.), Mapping the Nation,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6): 39-77;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Fredrik Barth,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70): 9-38; Peter L. Berger/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Anchor,1967).

^{註八} Ernest Renan: Qu' est-ce qu' une nation? Conférence faite en Sorbonne, le 11 mars 1882. Paris 1882.

^{註九} Raj Vasil, Asianising Singapore-The PAP' s Management of Ethnicity (Singapore: Heinemann Asia. 1995); Ingrid Glad, An identity dilemm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rimary education for ethnic Chinese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building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Oslo, Norway: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98); Hussin Mutal-

分尷尬且謀合不易，因而糾紛時有所聞。^{註二}

在臺灣，五大族群中三大主要族群（閩南、客家、外省）的原生因素都有很大的共性，再加上相當的建構因素，因而在實際上（*de facto*）具備組成國家的要件。但因兩岸分離，使得情況比較複雜。而在區分此三大族群時，方言就是一個比較明顯的標誌。^{註三}在大陸，其境內漢族與 55 個少數民族（*nationality*）的原生因素差異甚大，而建構因素也出現狀況，比如疆獨與藏獨的分離意識，使得北京政府花下大量的人力物力，來處理民族問題。^{註三}因此，由於民族的概念帶有較強的主權意味，在對外方面，北京政府近年來的用法已有所修正，其中中國國家民族委員會的英譯名已從 The State Nationality Affairs Commission 改為 The State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就是最佳例證。^{註三}

更進一步觀察民族與國家組成的原因可

知，歸根結蒂還是利益導向，此乃可分為精神與實質兩方面來觀察。在精神上，此乃一種與眾不同甚或自識優越（*ethnocentrism*）的群體感知；在實質上，安全與發展乃必要的因素。易言之，尊嚴與生存乃其最根本的原因。其中新加坡就是最佳實例，若不是自認為可以創造更佳的生活條件，這些族群的人們大可回到各自的母國，何必共同生活在一起？

再以歐洲聯盟的情況來說明。歐盟乃由歐洲 27 國所組成，是當今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國家聯合體，各會員國都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各自也有各自的國家與民族的認同。目前，各該國人民對於歐盟的認同雖然薄弱，這主要因為不少歐洲民眾始終認為，各國政府可能比歐盟還更能維護其利益，比如有關物價與失業等問題，歐盟的政策時常顯得緩不濟急與遙不可及。可是，面對當今全

ib, "National identity in Singapore: old impediments and new imperatives," in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 no. 2, pp. 28-45. 1995;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ebd., *National Identity*, Harmondsworth, 1991; Jonh Breuilly, *Approaches to Nationalism*, Gopal Balakrishnan (ed.), *Mapping the Nation*, London, New York: Verso, pp. 146-174; Donald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51-54; David C.L.Ching, *The Overseas Chinese Entrepreneurs in East Asia: Background, Business Practices and International Networks* (Melbourne,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ustralia, 1993):27; Yen Ching-Hwang, *The Ethnic Chines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Times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02): 3-22.

^{註二} Hoon, Chang-Yau, *Reconceptualising Ethnic Chinese Identity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2006, <http://theses.library.uwa.edu.au/adt-WU2007.0065/public/02whole.pdf>; Fischer, Clare Benedicks, *Chinese Indonesian: Possibilities for Civil Society*. Starr King School for the Ministry, 2004, <http://www.skism.edu/research/papers/chineseindonesian.pdf>. 王甫昌，邁向臺灣族群關係的研究與理論：族群與社會專題導論，臺灣社會學，第四期，2002 年 12 月，頁 1-10；國策研究院，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民國 82 年；施正峰，臺灣族群政治，<http://www.wufi.org.tw/shih/ethnic.htm>；陳癸淼，論臺灣——為臺灣把脈，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2 年。

^{註三} 見本文貳、微觀視角。

^{註三} 陸煜，中國族群理論的先河，www.booker.com.cn/gb/paper19/7/class001900001/hwz53989.htm；龔學增，中國特色的民族問題理論（北京：中共中央黨校，1996）；布赫（主編），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呼和浩特，蒙古大學出版社，1995）。

^{註三} 中國國家民族委員會網站：http://www.seac.gov.cn/gjmw/xwzx/M010906index_1.htm.

球化以及國際上多變的局勢，比如東亞的興起，恐怖主義與傳染病以及氣候變遷等議題，單一國家都必須訴諸整體才能比較有效地予以因應，因此各國政府與人民對於歐盟的認同勢必增強。^{註四}

其實，民族與國家的概念最早都是源於歐洲，^{註五}此乃與中國傳統家天下以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夷狄與華夏之分，差異甚大。直至 19 世紀後半，中國被列強入侵，中國人的國家與民族意識才開始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註六}但以歐洲的情況觀之，其中也有相當的差異。^{註七}

當中古世紀晚期（約 1500 年），法國、英國與波蘭等都已經建立了王朝，可是德國遲至 1871 年才建國。因而，當周邊國家長久以來視民族與國家兩種概念已趨於等同，兩個詞彙已經交互使用之時，德國的民族概念還分為文化民族(Kulturnation, Meinecke)^{註八}以及國家民族(Staatsnation, Herder)，而也稱為遲

到的民族(verspätete Nation)。

直至冷戰時期，這種二分的認同法還一直深入德人民心。再加上兩次大戰慘痛的教訓，此乃都是因為統一與強大的德國所引起，因而在二次戰後德國人民對於國家的認同反而顯得比較畏縮，此乃與中國人民長久以來的意願剛好相反。^{註九}基於百年來被帝國主義蹂躪的慘痛經驗，中國人一直期盼一個統一與強盛的國家，這個意向至今沒有改變。

所以，在 1969 年西德政府提出「一族兩國」(eine Nation, zwei Staaten)的政策，而東德政府則以資本主義民族與社會主義民族的「兩族兩國」(Kapitalistische und Sozialistische Nation; zwei Nationen, zwei Staaten)政策為對抗。^{註十}在當時東西歐對峙嚴重的情況下，雙方仍能各自表述，求同存異，和平共存，也達到了緩和歐洲對立局勢的目的，由此可見民族內涵的重要性、可塑性與多樣性。同

^{註四} Drulak, Petr (ed.), National and European Identities in EU Enlargement. Views from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ragu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1); Cerutti, Furio, A political Identity of the Europeans? Thesis Eleven, No. 72, February 2003: 26-45.

^{註五} Hans-Werner Gille, Nation Heute (München: Bayerische La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n Bildungsarbeit, 1977); Eberhard Schulz, Die deutsche Nation in Europa (Bonn: Europa Union Verlag, 1982); Werner Weidenfeld, Die Frage der Einheit der deutschen Nation (München, Wien: Günther Olzog Verlag, 1981).

^{註六} 古希臘與羅馬人也曾依照聖經，來區分基督徒與非基督徒，此乃與中國以文化為區分的標準不同 Mattison, Mark M. "What is a Christian?". True Grace Ministries. <http://www.auburn.edu/~allenkc/openhse/christian.html>. 張學智，王夫之〈春秋〉學中的華夷之辨，中國文化研究，2005 年 2 期。

^{註七} Hans-Werner Gille, Nation Heute (München: Bayerische La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n Bildungsarbeit, 1977): 15-19.

^{註八} Georg Schmidt, Friedrich Meineckes Kulturnation. Zum historischen Kontext nationaler Ideen in Weimar-Jena um 1800.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84, 2007, S. 597-622.

^{註九} 龔學增，中國特色的民族問題理論（北京：中共中央黨校，1996）：1-2；胡錦濤紀念「告臺灣同胞書」30 周年座談會上講話，<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8/4/4/7/100844796.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844796>.

^{註十} Ulrich Scheuner, Das Problem der Nation und des Verhältnisses zu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Klessmann, Christoph, Zwei Staaten, eine Nation. Deutsche Geschichte 1955-1970 (Bonn: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1988); Jacobsen, Hans-Adolf/ Leptin, Gert/ Scheuner, Ulrich/ Schulz, Eberhard (ed.), Drei Jahrzehnte Aussenpolitik der DDR (München: Oldenburg Verlag, 1979): 85-108; Schmid, Karin, Die deutsche Frage im Staats-und Völkerrecht (Baden-Baden: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1980): 45-89.

時，德國的實例也顯示，國家的性質也是可以經由特殊承認的方式來改變，比如當時西德不把東德視為外國，但放棄封鎖東德的國際承認與參與，就是一項創舉。

相對的，在兩岸方面，1999 年李登輝的「特殊國與國關係」，以及 2002 年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都受到北京的強烈抗議。^{註三}直至 2008 年，馬英九提出基於「九二共識」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之間特殊關係的模式，雙方才找到了和解的基礎。^{註三}由此可見，北京對於國家的概念仍舊極為敏感，但中華民族內的兩個地區則是目前可以接受的安排，而這種「一族兩區」的模式，就好像介於中共「一國兩制」以及西德「一族兩國」之間的一種設計。

再以民族與國家之間的關聯性來觀察，兩者之間也有多種組合。^{註三}比如一國一族或稱為國族（日本、波蘭以及以色列），也有一國多族（比利時、加拿大與新加坡），而中國的情況則好似介於兩者之間，因為漢族佔 90% 以上的絕對多數，情況比較特殊。若以中華民族觀之，此乃一國一族，但是，部分少數民族並不接受此觀點，因而形成一國多族。另外，還有一族多國（東歐的斯拉夫民族國家如波蘭、捷克與俄羅斯等）與一族無國（庫德族、吉普賽人與以色列建國之前的猶太族）的事例，由此可見民族與國家之間的多重複雜性。

綜合言之，臺灣政治認同的主要因素中，各族群之間原生因素的共性甚強，此乃當前臺灣社會穩定的重要原因。再加上，兩岸分離與意識形態的對立，在此內外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下，使得雙方各自為政，無法融合。直至馬英九主張「一族兩區」的政策，雙方才開始加強交流，乃為臺灣認同的新發展。由於「一國」臺灣無法接受，「兩國」北京無法接受，而「一族」雙方都能容忍，由此可見民族與國家認同的差異性與重要性。

肆、微觀的視角

一、臺灣的經驗

臺灣是一個移民的社會，若以族群來臺的時間作區分，其先後則可分為原住民、河洛、客家、外省與新移民等五大族群。^{註四}其中原住民乃臺灣最早的居民，屬於南島民族，但只佔臺灣人口不到 2%，因而影響力較小。此外，早在宋元兩代就有大量的漢族移入，其中主要是以閩粵地區為主。1624 年至 1662 年乃荷蘭據臺時期，當時乃第一個統治臺灣的政權。^{註五}基於建設的需要，荷人積極引進漢人移民，也對原住民帶來羅馬拼音法以便傳教。自 1662 年鄭成功驅逐荷蘭人之後的兩百多年內，大量內地移民再度入臺，並與原住民通婚，形成臺灣的主體族群，但也與內地文化形成區隔，埋下日後臺灣文化對抗中國文化的種子。

^{註三} 黃昭元（主編），兩國論與國家定位（臺北：學林文化，2000）；聯合新聞網——總統世臺會一邊一國論專題，<http://issue.udn.com/FOCUSNEWS/TWOSIDES/>。

^{註三} 馬：92 共識可反對但不能否定，<http://www.libertytimes.com/2008/new/mar/29/today-fo5.htm>。

^{註三} Eberhard Schulz, Die deutsche Nation in Europa (Bonn: Europa Union Verlag, 1982): 37-92.

^{註四} 徐富珍、陳信木，《蕃薯＋芋頭＝臺灣土豆？——臺灣當前族群認同狀況比較分析》，臺灣人口學會 2004 年年會暨「人口、家庭與國民健康政策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在臺灣，一般都只稱為四大族群，第五族群是筆者另加。

^{註五} 荷據時期，<http://taiwanus.net/history/1/index.htm>。

客家族群則以刻苦團結與剛毅為特質，曾與閩南人因爭地等原因相互抗爭。外省人則是 1949 年追隨蔣介石抵臺的不到兩百萬軍民，因而含括各省人士，故統稱為外省族群，並在戒嚴時期掌握了中央的執政權。而所謂新移民則包括近 20 年來的大陸與外籍新娘，若加上其子女，人數接近 40 萬，已接近原住民。^{註三}

(一)日據時期

從歷史的角度觀之，歷代的皇朝其實均未重視臺灣的存在。^{註三}直至後來清代施琅提出「恭陳臺灣棄留疏」後攻臺，康熙才在 1684 年正式將臺灣納入大清版圖，隸屬福建省，此乃臺灣人民在認同問題上的新開始。一般而言，在這段時間的臺灣人民大多只有族群的認同，比如漢移民與平埔族之間的融合，以及閩南人與客家人之間的衝突等，根本談不上對於國家與民族的認同。

臺灣人民首次在認同問題上的重大變化，乃始於 1895 年馬關割臺。^{註三}在馬關條約第五款中明確規定，臺灣人民可在兩年內變賣家產回歸祖國，但不願離去者則被視為日本臣民。^{註三}依照統計，當時回歸者不到臺人的 1%。這主要還是由於安土重遷以及經濟

能力等因素的影響。再加上，當時一般臺灣民眾根本無法想像日後還有回歸祖國的可能，因而歸順日本自然順理成章。

另一方面，當時臺人深感被祖國遺棄，因而部分群眾武裝反抗，長達 20 年之久，但終被擊潰，這當然也是受到民族認同因素的影響。當時，仍舊有不少知識份子不願做日本的順民，始終堅持對於漢人的認同，比如林獻堂與蔣渭水，因而產生了親中派與親日派的認同差異。^{註四}這個轉變，可以視為臺灣人民在民族認同上的開始，完全與上述經由外在威脅而產生的政治認同模式相符。

繼之，1911 年辛亥革命前後，當時孫中山與梁啟超對臺灣的知識份子都有相當大的影響。孫中山在革命之前主張驅逐韃虜，此乃漢族與滿族的對抗，但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後，則主張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之後又以「中華民族」來予以概括，^{註四}此乃民族大融合的政策，其變化極大。這對於當時還處於日據時代的臺灣而言，其影響則是革命派的建立，臺人對於國家的認同也開始萌芽。1921 年中共成立後，臺灣共產黨也因運而生，因而使得意識形態也對國家的認同產生

^{註三} 中華民國內政部 2007 年 1 月《內政統計通報》，<http://www.moi.gov.tw/stat/>。

^{註三} 康熙皇帝曾云：「…臺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張春英，海峽兩岸關係史，第二卷（臺北，海峽學術，2008），頁 52-54。

^{註三} 戚嘉林，臺灣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7），頁 227-237。

^{註三} 馬關條約原文，請參見：<http://www.ydjh.chc.edu.tw/society/history/historyimage/8.htm>。

^{註四} 林獻堂成立臺灣同化會，追求臺灣人與日本人的地位平等。1920 年 1 月，留日臺灣青年在東京發起新民會，推舉林獻堂為會長，主張改革臺灣政治體制。1921 年，蔣渭水等人在臺北成立了「臺灣文化協會」。王曉波，臺灣抗日五十年（臺北，正中書局，民國 86 年），頁 64-81；戴寶村，林獻堂與近代臺灣民主運動，<http://www.twhistory.org.tw/20011022.htm>。

^{註四} 英國學者 Hughes 認為，民族一詞乃 1899 年梁啟超首用，而民族主義也是梁啟超在 1901 年首用。見 Christopher Hughes, Taiwan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1997): 3；孫中山，“1920 年 11 月在上海國民黨本部會議”，孫中山全集第 1 卷（臺北：中華書局，1991），頁 394。

了影響。雖然國共曾合作一段時間，但後來還是水火不容分道揚鑣，增加了臺人對於國家認同的複雜性。

1931年918事變爆發，也激化了臺人反日的情緒。繼之，1937年蘆溝橋事變之前，日方為自保與自強，積極斷絕兩岸之間的連繫，並對臺灣人民推行皇民化政策，紛紛強迫臺人改日姓與學日語，並以二等日本公民視之，還組織臺灣軍伙到南洋替日軍効命，強化了臺人對於日本的認同^{註四}。雖然如此，反對効忠日本天皇者仍不在少數，其中乃以一些知識份子的反應比較突出，由此可見臺人對於國家認同的影響。

由於大多數民眾無法抗拒日本的政策，這對於臺灣的庶民文化也產生一定的影響。當日本入臺時明治維新已經三十餘年，因而日本文化中也夾雜了部分西方文化，一併影響臺灣並與中華文化相互結合與激盪。1945年日本戰敗，當時臺灣民眾張燈結綵，慶祝回歸祖國，但同時國共內戰日熾，導致臺灣人民的認同再度變化，共分為親國府、親共以及親日等幾大派別。

綜上所述，可以確認，臺灣人民認同的變化乃以祖國的治亂變遷為依歸。此乃始於清帝的毫不重視以至於被祖國遺棄，然後再度收復回歸以至於國共內戰分裂，對於臺灣人民的命運與認同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但是，就算在日據時代後期，日方也無法完全轉化臺灣人民對於祖國的認同觀，亦可見

當時部分臺灣人民對於國家與民族認同的堅持。就在這段時間當中，臺灣人民的政治認同始於族群認同，再經由民族認同後產生國家認同，此乃與許多國家的認同過程相似。但日後內戰的分裂以及意識形態的對立，再加上本土勢力的興起，增加了臺人認同的複雜性。

(二)戒嚴時期

當國府於1949年播遷來臺時，就面臨了相當的困境。在此之前，228事件於1947年爆發，臺灣民眾對於國府的印象受創，增加了國府對於臺人反抗的戒懼。^{註五}再者，基於國府抗日與仇日的原因，此乃與一般臺灣人民對於日本統治並無惡感的情況有相當的差距，而228事件更助長了親日派與自主派的生成。還有，當時中共新政權在大陸人民中的形象極佳，也吸引了一些臺灣民眾的認同。但由於共產中國未能被西方世界所接受，當時國際上支持國府的力道不小，故使其還得以正統的中國繼承者自居。^{註四}

因而，自1950年代初以來，國府一方面實施戒嚴政策與土地改革，使得親共派與自主派被強力打壓，部分既得利益者也受害，埋下後來族群對立的態勢與臺獨的種子。另一方面，國府強調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直至孫中山與蔣介石的所謂道統，其中包括對於中華民族以及中華民國的認同，以強化其在臺灣執政的合法性，因而更加壓抑臺灣的主體性認同與思維。^{註五}

^{註四} 期間日本組織高砂義勇隊，前往南洋作戰。戚嘉林，臺灣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7），頁327-333。

^{註五} 戚嘉林，臺灣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7），頁409-460。

^{註四} Gottfried-Karl Kindermann (ed.), Chinas unbeendeter Bürgerkrieg. Im Spannungsfeld Peking-Taiwan 1949-1980 (München, Wien: 1980).

^{註五} 陳奕麟，解構中國性：論族群意識作為文化作為認同之曖昧不明，臺灣社會研究，33期(1999/03): 103-131。

上述這種情況，使得國府維持了原本的中原史觀，同時完全漠視臺灣史，其中尤以對於 50 年日據時代的歷史為甚，因而只強調鄭成功的反清復明等適合當時反攻復國政策的部分，使得當時的學生與民眾對於臺灣的現代歷史一無所知。

自冷戰時期以來，大陸上的政治活動此起彼落，中共在 1960 年代進行文革，而國府則以文化復興運動相對應，更增強了其正統中國的地位。當時，由於兩岸的軍事對峙以及美國的強力支持，導致美國的通俗文化普及臺灣。雖然 1971 年國府退出聯合國，美國與西方世界對臺灣政治經濟與文化方面仍有極大的影響，比如我國歷任內閣閣員中留美的人數都佔極大多數，就是一個極佳的例證。此外，還有西方天主教與基督教的影響也是隨處可見。

自 1970 年代末以來，由於兩岸與國際情勢的轉變，使得臺灣的認同問題再度發生變化。^{註 19} 1978 年 12 月，中共舉行 11 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新路線，同月在高雄也爆發了「美麗島事件」，黨外人士遭到大規模的逮捕。1979 年元旦，葉劍英提出和平統一的政策，兩岸的對峙也開始緩解，當日美國與中共建交，對於臺灣的安全打擊甚大。

在臺灣內部，由於強烈反對運動的影響，以及國際上對於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壓力，逼使國府當局逐漸做出讓步，黨禁、報禁相繼解除，1986 年 9 月 28 日，民主進步黨成立，1987 年 7 月 15 日國府正式宣布解除戒嚴。

由此可知，在戒嚴時期，以道統為內涵的大中國思想，不論是中華文化、中華民族與中華民國等認同的主體，確實佔據了臺

灣人民在政治認同方面的主流地位，而對於臺灣本身的認同，則受到國府當局的打壓。但是，由於國內外的情勢轉變以及反對勢力的興起，情況大為改觀，這確實給予臺灣人民在政治認同方面另一種選擇。

(三)民主化時期

在 1991 年 5 月 1 日，前總統李登輝宣布結束施行長達 44 年的「動員戡亂時期」。^{註 20} 李登輝繼承蔣經國的民主化與本土化路線，使原本在大陸選出的國民大會、立法院以及監察院的代表及委員，在同年底全部宣告退職。同時，李登輝自 1990 年代以來就積極顯現了臺獨的傾向，導致 1993 年國民黨分裂，部分主張國家統一的國民黨員另外組織新黨。在經過修憲之後，臺灣於 1996 年舉行首次總統直選。自此，臺灣在事實上(de facto)放棄對於大陸的主權訴求，但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的規定，對於大陸法理的(de jure)主權訴求並未改變。

為檢視這一段時間以來臺灣人民的政治認同問題，本節將分別從選舉的結果、政黨的支持度、統獨的傾向以及對於中國人與臺灣人的認同等幾個角度切入，以期獲得比較完整的探究。

觀察（表 1）臺灣各政黨發展的情況可知，原本一黨獨大的國民黨日益被主張臺獨的民進黨以及主張統一的新黨所瓜分。雖然如此，從第三與第四屆立法院的選舉結果可知，國民黨仍能維持接近半數的 46% 得票比例以及立院過半的席次。但是，2000 年總統大選失敗後，國民黨再度一分為三，親民黨在 2001 年獲得 18.6% 的票數，以及主張獨立的臺聯也獲得 7.8% 的選票，使得民進黨以

^{註 19} 張春英，海峽兩岸關係史，第四卷（臺北，海峽學術，2008），頁 1-68。

^{註 20} 齊光裕，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臺北：揚智，1996），頁 643-830。

表1 近年來立委選舉各黨得票率與席次比率^{註四}

日期	國民黨		民進黨		新黨		親民黨		台聯黨	
	得票率	席次率	得票率	席次率	得票率	席次率	得票率	席次率	得票率	席次率
95/3	46.1	51.8	33.2	32.9	13.0	12.8	尚未成立		尚未成立	
98/4	46.4	54.7	29.9	31.1	7.1	4.9	尚未成立		尚未成立	
01/5	28.6	30.2	33.4	38.7	2.6	0.04	18.6	20.4	7.8	5.8
04/6	32.8	35.1	35.7	39.6	0.12	0.01	13.9	15.1	7.79	5.3
08/7	58.12	72	41.88	28	3.95*	0	參與國民黨		3.53*	0

38.7%的席次比率首度成為立法院第一大黨。2004 年國民黨雖曾加緊追趕，但是民進黨仍以 39.6%的席次率再居立院第一大黨地位。直至 2008 年國民黨大勝，情勢才大為改觀，目前，國民黨佔據立法院接近 3/4 的席次。

綜合言之，在國民黨執政 50 年之後，臺灣的經濟情勢雖然仍佳，但是選民依舊求變，其中國民黨政治的傲慢以及貪腐，確實不得民心，再加上內部分裂，終於導致 2000 年總統的選舉失敗以及 2001 年民進黨立委選舉大勝。但是，在民進黨陳水扁第二任期貪腐案曝光之後，情勢急轉直下，再加上該黨一直主張臺獨的路線，使得兩岸以及臺美關係都受到極大的衝擊，終於導致國民黨與馬英九 2008 年的大勝。

其實，自李登輝執政的後期開始，原本大中國的思想就日益遭到挑戰，有心人士確實將正視臺灣歷史視為重要的目標，以便達到臺獨的目的，因而加緊填補空隙與充實內容，並主張中華文化是臺灣文化一部分，

後者包括荷西殖民文化、明清閩南文化、日本殖民文化與大陸移民文化以及部分美國通俗文化等。^{註四}再以目前臺灣高中學生的歷史課本來觀察，與以往最大不同之處，就是將原本的本國史分為中國史與臺灣史，而臺灣史部分則繼史前時期之後就直接進入 1600 年國際（荷西）競爭時期，其後就是 1662 年明鄭時期、1683 年清領時期、1895 年日治時期，直至 1945 年中華民國在臺灣，臺灣史觀也日臻成熟^{註五}，並以此來對抗國民黨的中原史觀。

目前，馬英九主張「不統、不獨、不武」的三不政策，但是，國民黨始終堅守中華民國憲法，因而並未放棄對於國家的統一的最終目標，故在有關政治認同方面，國家認同的標的是中華民國，概無疑義，此乃與民進黨有意以臺灣共和國取而代之的政策來相抗衡。再者，在民族認同方面，馬英九亦主張兩岸都是同胞，言下之意此乃中華民族的再現。^{註五}相對的，民進黨則處心積慮地進行所謂臺灣民族構築(nation building)的工程，

^{註四} 採自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http://210.69.23.140/cec/cechead.asp>。*代表投給政黨的票數比率，由於首度採行「單一選區兩票制」，政黨票未超過 5%因而不列數計算，也未能獲得立院席次。

^{註五} Taiwan Agenda in the 21th Century, edited by Taiwan Advocates（群策會），Taipei, 2003.

^{註六} 陳光興，為什麼大和解不可能？〈多桑〉與〈香蕉天堂〉殖民／冷戰效應下省籍問題的情緒結構，臺灣社會研究 No.43 (2001/09): 41-110。其中日治時期乃有別於筆者所主張的日據時期。

^{註七} 見馬英九 2008 年總統就職演說，但因事涉敏感馬英九並為經常提及中華民族。馬英九總統就職演說全文「人民奮起，臺灣新生」<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may/21/today-fo7.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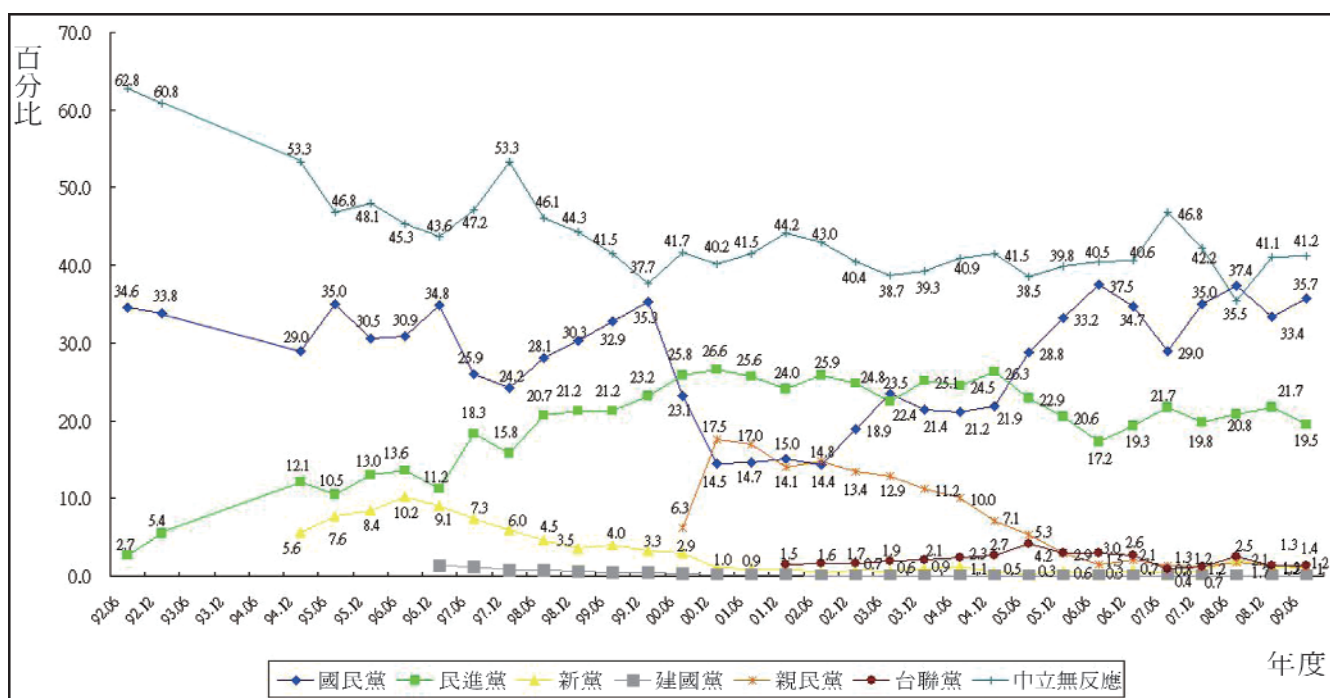


圖1 臺灣民眾政黨偏好分佈(1992~2009.06) 註五

這就是藉由正名政策與修改教課書等方式，來建立臺灣人是臺灣人而不是中國的新認同，只是未能克盡其功，目前馬英九新政府正有意修正此一政策，這對於民眾的認同當然也會產生相當的影響。

再以民眾對於政黨的偏好觀之（圖1），在1992年時，國民黨以34.6%的比例遠超過只有2.7%支持度的民進黨。但民進黨一路攀升，至2000年獲得26.6%甚至超過國民黨的14.5%，當然，當時親民黨17.5%的支持度確實對於國民黨影響極大。此後，國民黨加緊努力，才在2005年以後與民進黨拉開距離，直至2008年雙方各佔35.7%與19.5%。值得注意的，還有41.2%得受訪者採取中立的態度，顯見民眾對於政黨的觀感趨於保留

所致。

再以臺灣民眾對於臺灣人與中國人的認同觀之（圖2），其演變明顯。在1992年，主張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由26.2%一路下滑到2008年的4.2%，相對的，主張自己是臺灣人的比例，則從1992年的17.3%一路攀升至2008年的50.8%。這主要是自李登輝晚期提倡本土意識，再加上民進黨執政8年，總共十多年來所塑造的一種臺灣主體性時代氣氛（Zeitgeist）^{註五}的結果。

此外，臺灣民眾對於大陸的觀感，也是增加臺灣人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筆者曾在十餘年前，綜合觀察臺灣人民的心態，以及援引「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理論，而提出所謂「壓在臺灣人民身上的三座

註五 <http://esc.nccu.edu.tw/newchinese/data/partyID.htm>.

註五 此處作者藉用 Zeitgeist 的概念，其實應翻譯為時代精神，但是這又好似略為超過臺灣的情況，故以時代氣氛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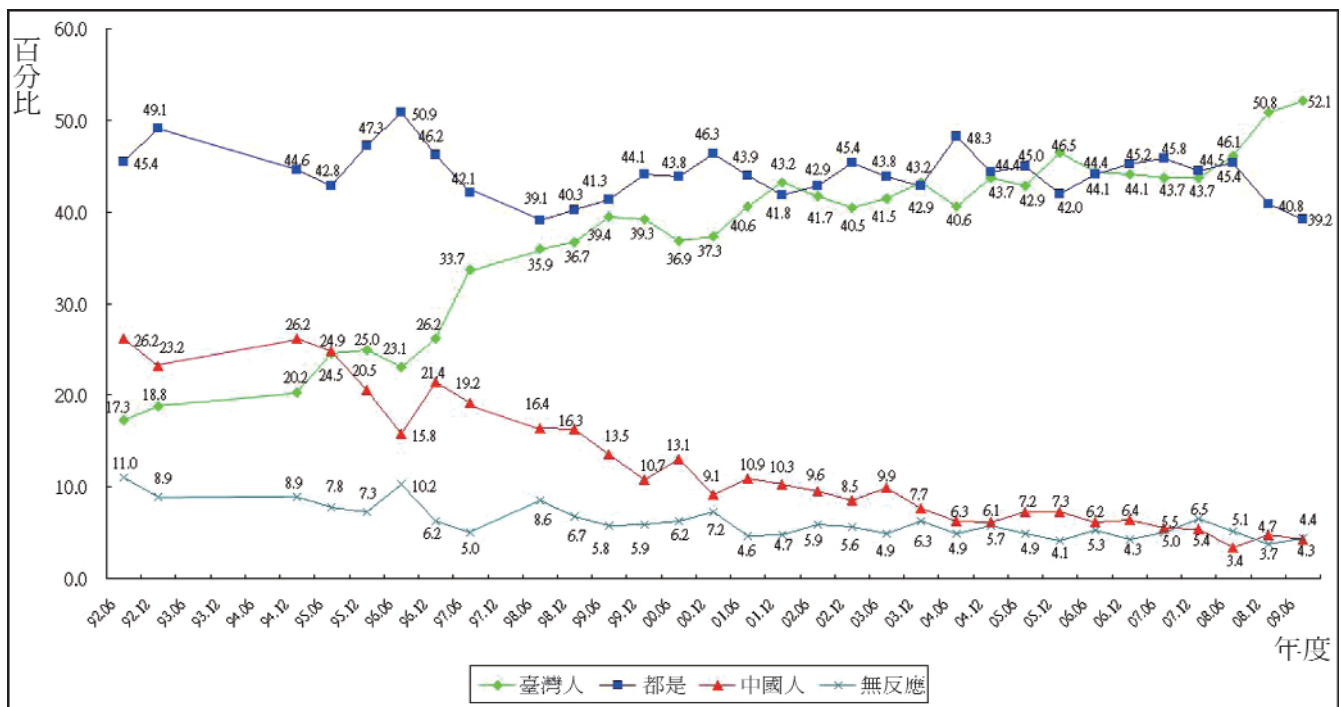


圖2 臺灣民眾臺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1992~2009.06) 註焉

大山」的論述，^{註焉}其中包括：北京對臺政策中不放棄武力與外交圍堵，以及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共產黨專政等內涵，此乃臺灣人民耿耿於懷以及難以解開的心結。易言之，臺灣人民自感其尊嚴被蔑視，生存與發展被威脅，因而增加了對於中共政權的厭惡，自然就反饋在對於臺灣人的認同上。

其實，這種認同方式可能無法完全符合臺灣人民的選擇，因為問題中的中國人被視為是對岸的人民，文化與政治認同結合在一起。筆者曾以政治大學「歐盟的兩岸政策」通識課近 70 位同學做問卷調查，其中還加了一個「政治的臺灣人，文化的中國人」的新選項，結果卻獲得 46%最高的認同，由此可

見臺灣的大學生在認同方面的分歧。^{註英}

再以 2008 年 8 月馬總統上臺後不久，臺灣人民對於統獨看法的民調，與最新的 2010 年 4 月的民調相比（圖 3），其中最大的兩部分就是維持現狀以後決定(34.4% vs 38.7% = +4.3%)以及永遠維持現狀(22.4% vs 25% = +2.6%)，兩者加起來就接近 2/3(56.8% vs 63.7% = +6.9%)。其次，才是維持現狀以後獨立(17.5% vs 15.8% = -1.7%)，若加上立刻獨立部份(8.3% vs 4.9% = -3.4%)，也將超過 1/5(25.8% vs 20.7% = -5.1%)。其餘則是維持現狀以後統一(8.6% vs 8.6%未變)以及立即統一部份(1.5% vs 1.5%未變)，兩者相加也只有 10.1%，是屬於最少的部分。綜合觀之，在過

^{註焉} <http://esc.nccu.edu.tw/newchinese/data/TaiwanChineseID.htm>.

^{註英} 此乃作者於 2000 年 11 月 25-28 日，在廣州中山大學參加以「新經濟」與兩岸四地的交流協作為主題的「中華經濟協作系統第六屆國際研討會」時首度提出。

^{註英} 此乃筆者於 2009 年 10 月 6 日做的調查，其中認同自己是臺灣人的比率有 43%，認同自己中國人的只有 4%，兩者皆是的有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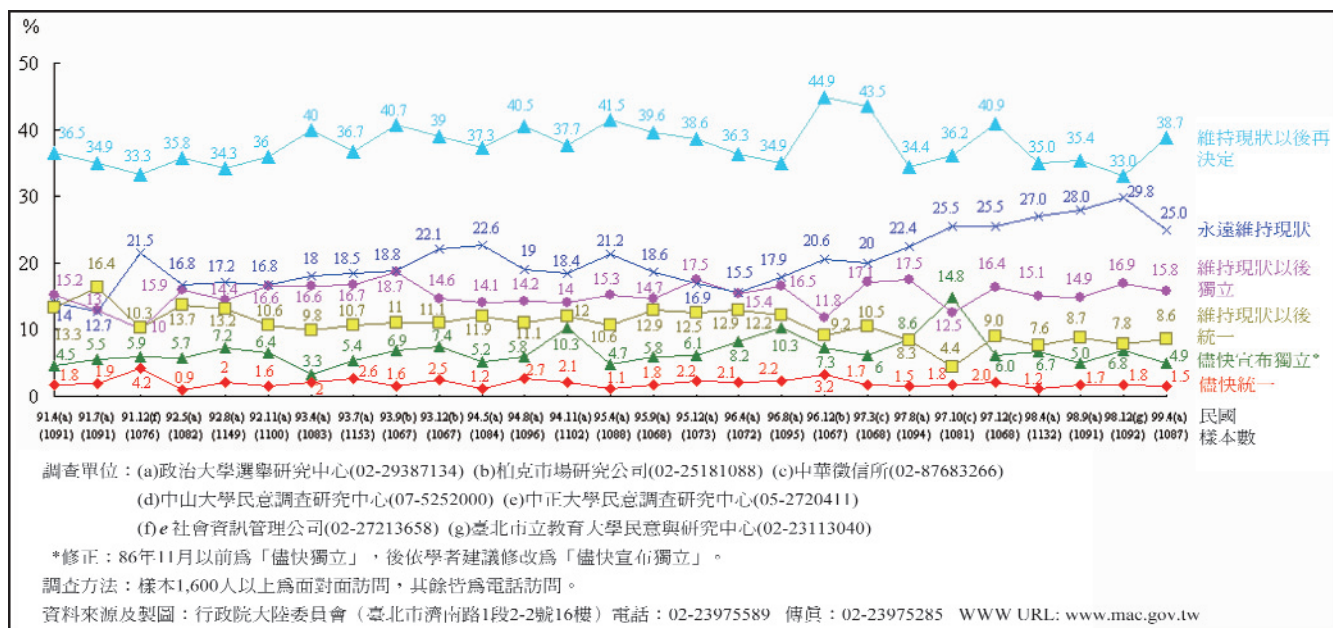


圖3 民眾對統一、獨立或維持現狀的看法——折線圖^{註五}

去的兩年來，主張維持現狀的增加比較多(6.9%)，而主張獨立的下降也不少(5.1%)，唯獨主張統一的基本沒有變化。

再以整體觀之(圖3)，在調查的這段時間內(自民國90年3月至民國99年4月)，維持現狀以後決定(36.5% vs 38.7%=+2.2%)以及永遠維持現狀(14% vs 25%=+9%)，兩者加起來增加11.2%。其次，維持現狀以後獨立(15.2% vs 15.8%=+0.6%)與立刻獨立(4.5% vs 4.9%=+0.4%)總共增加1%。至於維持現狀以後統一(13.3% vs 8.6%=-4.3%)以及立即統一部份(1.8% vs 1.5%=-0.3%)則降低4.6%。綜合觀之，在過去的十年來，主張維持現狀的增加最多(11.2%)，而主張獨立的增加1%，唯獨主張統一減少一些(4.6%)。由此可見，臺灣人民對於統一與獨立的看法已趨於穩定，易言之，若除去急統與急獨以及無反應的部分(4.5%+1.8%=6.3 vs 4.9%+1.5%=

6.4%)，主張保持現狀者佔絕大多數，由此可見臺灣人民對於統獨都難以接受的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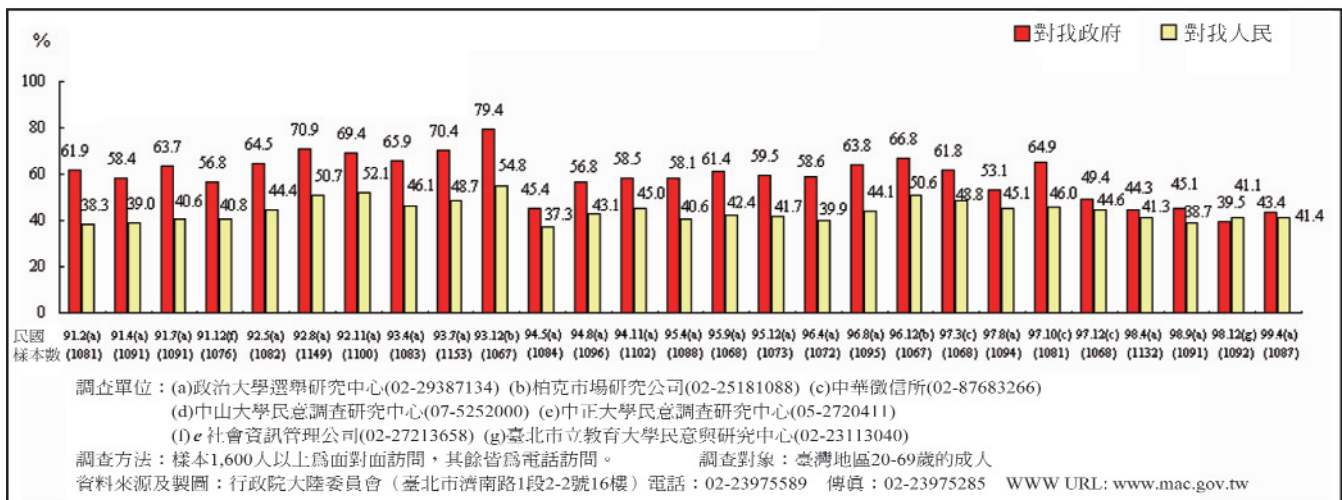
其實，若與德國的情況相比，仍可看出與兩岸相似之處。依照1979年的一份問卷資料顯示，^{註六}當時西德人認定西德是德國的佔57%，認為是西德加上東德的只有27%，認為是德意志帝國的只有16%。對此，一般西德人對於其生長地區的認同，乃自然的發展，況且，西德的實力與各種條件都要優於東德。另外，在1981年的問卷中，西德人民中希望德國統一的人約佔60%，但是也有同樣多的西德人認為統一根本不可能。未料，德國在1990年就統一了，極為出乎兩德人民以及世界各國的意料之外，可見情勢的轉變確實超乎人們的想像，這是否給於臺灣人民一些警示？

再以2008年8月與2009年4月，民眾對於當前北京政府對於臺灣政府與人民之

註五 <http://www.mac.gov.tw/public/Attachment/0521958555.gif>.

註六 湯紹成，德國模式淺析，問題與研究，第27卷，第8期，民國77年5月，頁72-88。

表2 民眾認知大陸政府對我不友善態度^{註五}



看法的民調來觀察（表2），對我政府不友善的部分由 53.1%降至 44.3%(-8.8%)，對我人民不友善的部分由 45.1%降至 41.3%，減少了 3.8%，由此可知，臺灣人民認為北京政府對於我政府與人民不友善的部分都有相當的改善。若與民國 91 年的情況相比，對我政府不友善的比例由 61.9%降至 44.3%，減少了 17.6%，但是對於臺灣人民方面卻增加了 3%(38.3% vs 41.3%)，由此可見，北京在寄望於臺灣人民的政策方面還須加一把勁。

總之，在這一部分，可能還會有改善的空間。這主要是因為，目前馬英九政府才上台不久，雙方的關係進展大致順暢，尤其 2009 年八八水災時，大陸各界慷慨捐輸救濟，就是極佳的事例，這都是在問卷之後所發生。因此，除非發生比達賴訪臺還要嚴重的事故，否則兩岸關係的良性互動應該可期。

二、比利時的經驗

當拿破崙在 1814 年戰敗之後，荷蘭則接比利時地區，為防堵法國勢力的再度擴張，

荷蘭國王威廉一世(William I)施行荷語以利統治。在北部的法蘭斯德地區原本不成問題，但因當時的官僚體系都以操法語為時尚，而且才自拿破崙時代轉換不久，因而不願再學習荷語。反倒是在南部的瓦隆尼(Wallonia)地區則推行雙語制度，還比較順暢，此乃比國雙語制度的起源。^{註六}雖然荷蘭國王的雙語政策要比拿破崙的法語政策更加合乎民意，可是在執行的過程中導致了比國上層社會與既得利益者的強烈反抗，終於導致荷蘭的勢力退出以及比利時的獨立。因而形成目前比國內部有 40%的瓦龍人，主要是操法語，以及 60%的法蘭德人，則以荷語為母語。隨著國家的獨立，兩個語言族群的鬥爭與衝突才剛開始。

由於在獨立過程中，其主要的領導人物都是操法語者或是荷語區的法語人士，因而在獨立後荷語的合法性被排除。況且，雖然比國境內操荷語的人數比較多，但是掌握國家機器的公務員以及私人企業家等等，都是

^{註五} <http://www.mac.gov.tw/public/Attachment/05211001773.gif>.

^{註六} 前揭書，廖立文，比利時語族文化共同體與行政自治區之演變與現況；劉華宗，比利時族群衝突與政治危機，歐洲國際評論，第五期，2009 年，頁 1-38。

操法語，使得法語一時成為比國的官方語言，而許多操荷語者為求向上提升，都紛紛學習法語，因而導致北部民眾法蘭斯德運動(Flemish Movement)的興起，其目的就是要爭取荷語為與法語相等地位的官方語言。原先，因為這些積極人士的教育水準有限，因而他們都只能以社會運動為主體，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該地區民眾的水準有所提高，熱心份子得以進入議會，因而使得荷語的使用程度得到加強，終於在 19 世紀末成為法蘭德地區的法定語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佔領比利時，德軍利用比國兩個族群的矛盾，將法蘭德人推向前線來對抗法國，加深了與親法的瓦龍人之間的嫌隙。當時，比國的親德份子還曾把比利時分為兩個行政單位，並宣佈法蘭德地區獨立，首都為布魯塞爾，但後來終因德國的戰敗而解體。^{註六}二戰時期，德軍再度佔領比國，他們再度利用兩大族群之間的矛盾，並藉由與法蘭德人民比較接近的關係，來共同對抗瓦龍人的地下抵抗活動，因而更加深比國兩個族群之間的對立與仇視。

在德軍進駐時，比利時政府流亡英國，但是國王列歐普三世(Leopold III)卻向德軍投降。^{註七}但當 1944 年底德軍離境時，比利時國內則興起了忠奸的爭辯，許多曾與德國合作者被槍決，兩個族群之間的鬥爭，也為了是否讓國王列歐普三世回國而達到高潮。當時，這個鬥爭也延續了好幾年，同時也造成

了小規模的流血事件。直至 1951 年國王列歐普三世退位，由其子包德溫(Baudoin)繼任，此一全國性的動亂才得到平息。

(一)族群的融合與妥協

自從上述的大型動亂結束之後，自 1950 年代初起，比國的情勢有所轉變。一方面由於北部法蘭德地區的經濟增長較快，再加上人口也比較多，立法者修改多項有利於荷語的法律。相對的，瓦隆尼區則因經濟的蕭條，面對來自北方日益高漲的法蘭德人的影響力，他們也有類似的瓦龍運動，只是效果不彰，並未扭轉該地區落後的經濟趨勢，因而主張自治以及建立聯邦體制，以便分享北邊的富裕，此乃導致 1963 年比國首先出現了所謂的語言文化區(linguistic and cultural communities)的劃分，其中包括荷語區、法語區、布魯塞爾雙語區以及一個小的德語區。^{註八}由於各方都不願意造成分裂的事實，因而雖然兩大族群的鬥爭激烈，比如雙方都堅持自治也都有相當完整的地方行政體系，但都還維持了聯邦體制的運作，而首都布魯塞爾的情況則比較特殊。^{註九}

布魯塞爾位於法蘭德區，自 1830 年獨立以來，原本法蘭德人佔多數，但因瓦隆尼人不斷遷入成為少數。在經過長年的語言戰爭之後，直至 1988 年雙方才達成妥協，將布城定為比國第三個自治區，並實行雙語制。^{註十}依照相關的規定，布魯塞爾的所有機關、學校與街道都必須實行雙語制，但是目前的

註六 斯欽朝克圖，國家的雙語話與地區的單語化：比利時官方語言政策研究，北京，世界民族，2000 年第 1 期，頁 24-34。

註七 History of Belgium, <http://www.visitbelgium.com/bxhis01.htm>.

註八 依照比利時行憲法第四條的規定。Maureen Covell, Political conflict and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in Belgiu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993, 104, pp.65-86.

註九 前揭書，斯欽朝克圖，國家的雙語話與地區的單語化。

註十 Belgium's Language wars, www.economist.com/displayStory.cfm?story_id=1360463.

情況則是當地大多數的民眾還是講法語。在當地的醫院以及法庭等處所，荷語的使用程度還是不甚普遍，因而造成在布魯塞爾地區非法語族群的相當不便。而瓦隆尼人至今都未放棄在布魯塞爾推行法語制，比如主張居住在當地的外國人都應有選舉權等等，因為這些外國人多半是從其他家法國殖民地的移民，或是以操法語為榮者，依此觀之，該地區已儼然成為法語區。^{註六}

而在法蘭德區多半的民眾也都還能使用法語交流，只是到了南部的瓦隆尼區則只能以法語來溝通了。其中的原因很多，當然法國的傳統與影響力及法語地位的象徵，以及其優美的語調，再加上他們相對比較高傲的個性與本位主義等等。相對的，法蘭德區的民眾則比較隨和，其接納外界事務的程度比較高，妥協程度也較大。

另外一個明顯的標誌，則可從比國政黨的名稱看出。比利時有幾個比較大的政黨，其中多數的政黨名稱都是以地域或語言來標示，比如法蘭德基民黨(Christian Democrats and Flemish)、法蘭德社會黨(Flemish Socialist Party)、法蘭德自民黨(Flemish Liberal Democrats)與新法蘭德聯盟(New Flemish Alliance)。這種情況在法語方面也不惶多讓，其中包括法語人道與民主中心黨(Francophone Humanist and Democratic Center)、法語社會黨(Francophone Socialist Party)、法語改革運動

(Francophone Reformist Movement)等等，可見語言在政治上極其重要的影響力。^{註六}

此外，在比利時議會的各项表決與法律的頒布，都是使用兩種語言。在法院中的所有過程，也都是雙語制，只有地方的檢查機關則使用所在地的語言，而這也都是雙方相互爭取與妥協的結果。因為早在 1973 年法蘭德區就制定法律，規定該區只能使用荷語；在 1986 年瓦龍區同樣制定法律，規定該區只能使用法語。但是，由於造成了許多的糾紛與不便，比國仲裁法院終於在 1986 年做出裁決，將該法律予以廢止。^{註六}

在比國的各公務機關，也是使用雙語制，國家的中上級公務人員以及軍隊等等亦同。早在 1930 年代就成立的比國通訊社以及國家廣播局等，也是一樣。比國的媒體，比如發行量最大的「標準報」以及該國幾乎所有的主要報紙，也都是以兩種語言發行，此外，還包括郵票、硬幣、商標與路標等等。在宗教活動與教育系統方面，都是一樣，在法蘭德地區上課的母語是荷語，但法語是規定的第二語言；相對的，在瓦龍區法語是母語，而荷語則必須是第二語言，而布魯塞爾地區的學校則都是雙語教學。著名的比利時魯汶(Leuven)大學，也在 1968 年分為荷語部分與法語部分。自 70 年代以來，兩大族群之間的爭鬥，已比以往要平息許多。^{註六}

雖然如此，雙方的不滿情緒，還是時

^{註六} 前揭書，廖立文，比利時語族文化共同體與行政自治區之演變與現。

^{註六} 紀舜傑，比利時的國家認同，了解當代比利時民主政治學術研討會論文，臺灣國際研究學會主辦，2007 年 10 月 14 日，<http://www.tisanet.org/Activity/2007/%E8%AB%96%E6%96%87%E9%9B%86/12-%E6%AF%94%E5%88%A9%E6%99%82%E7%9A%84%E5%9C%8B%E5%AE%B6%E8%AA%8D%E5%90%8C.pdf>;
<http://www.belgium.be/eportal/application?languageRedirected=yes&pageid=aboutBelgium>.

^{註六} 前揭書，斯欽朝克圖，國家的雙語話與地區的單語化。

^{註六} Edmund A. Auger, Regional, national and official language in Belgiu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993, 104, pp.31-48.

有所聞。比如幾年前，當比國足球隊參加世界盃比賽的資格賽失利時，法語的媒體就立即攻擊國家隊的法蘭德籍教練。相對的，若是以往的情況，荷語的媒體也會立即攻擊瓦龍籍的隊員等等，這種情況還是一直不斷在發生。

自 2007 年以來，比利時分裂的情況日益嚴重，其中一度好幾個月聯邦政府無法組成。^{註_ㄡ}在今(2010)年 4 月，由於語言區域 Brussels-Halle-Vilvoorde 劃分的糾紛，內閣總辭，提前選舉。^{註_ㄣ}在 6 月的選舉中，^{註_ㄣ}主張法蘭德獨立的政黨法蘭德聯盟獲得大勝（150 席中 27 席，該地區 30%選票），比法語區的社會黨還要多出一席，這主要是因為當前比國的聯邦制度已經觸礁，同時，法蘭德人不願意再繼續以稅金來支援比較好享受的瓦隆人所致，這是否會造成比國的分裂，還有待觀察。依照比國的情況，就算是分裂，這也將會是和平協議的結果，而並非如臺灣獨立如此敏感。

伍、結 論

綜上所述，臺灣的政治認同問題實以其文化認同問題為基礎，先有文化認同然後產生政治認同，但當本土意識興起之後，政治認同則加緊形塑文化認同。

檢視臺灣政治認同的歷史經驗可知，由

於外在的刺激與威脅不同，此乃先由族群認同（漢族與平埔族）進而產生民族認同（漢族與日本人），最後國家認同（外族的入侵以及漢族與滿族的對立）才因運而生，這與世界不少國家的案例相似。在日據時代，臺灣人民曾激烈抗爭，但終於多數歸順。繼之，臺灣人民再與國民黨抗爭，終於大致融合，當前雖然藍綠對立，但仍不至於干擾民眾的一般生活，此乃由於各族群間的原生因素之共性較強所致，這些過程都對於臺人的認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再以比利時的歷史發展觀之，以及其介於荷蘭、德國與法國之間的地緣地位觀之，許多學者都認為比利時根本稱不上是一個國家，而只是歷史的意外以及大國之間鬥爭的結果。^{註_ㄣ}在過去的兩百年當中，比利時任憑周邊的大國進出，或可說比國的兩大語區，就好像是這些大國的尾巴，根本談不上一個共同的國家、民族以及文化認同。而位於這些大國之間的比利時人民，為自求多福，自然必須尋求自己的道路，此乃建構因素所致，而宗教的同一性，可說是兩大族群之間另一個穩定的基礎，這也可說是原生因素的影響。

若與臺灣的情況相比，兩者則可說是各有異同。在臺灣方面，中華文化傳統對於族群融合的貢獻甚大，但與多數案例不同的，

^{註_ㄡ} Belgium's Identity Crisis, September 17, 2007, http://gei.newamerica.net/publications/articles/2007/belgiums_identity_crisis_5945.; A nation divided - Belgium's identity crisis, September 18, 2007,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source=hp&q=Belgium%E2%80%99s+Identity+Crisis&btnG=Google+%E6%90%9C%E5%B0%8B&aq=f&aql=&oq=&gs_rfai=](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source=hp&q=Belgium%E2%80%99s+Identity+Crisis&btnG=Google+%E6%90%9C%E5%B0%8B&aq=f&aql=&oq=&gs_rfai=;).; Belgium's Identity Crisis. A Sign of Things to Come for the European Union? BY RYAN P. DENEE, February 10, 2008, <http://www.realtruth.org/articles/080201-005-bic.html>.

^{註_ㄣ} 比利時大選新弗拉芒聯盟黨獲勝，2010-06-14，<http://ap.ntdtv.com/b5/video/id/21302>; CD&V: "Open VLD stelde onmogelijke deadline", <http://www.deredactie.be/cm/vrtnieuws/politiek/1.768064>.

^{註_ㄣ} 比利時大選結果揭曉，2010 年 6 月 14 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57507/11882192.html>.

^{註_ㄣ} Richard Hill, We Europeans (Brussels: Europublic, 2002): 139-152.

在兩岸分離的情況下，臺灣本土勢力以及新興民族構築之間的競合。易言之，這就是臺灣史觀與中原史觀的對抗，以及臺灣文化與中華文化的主客體之爭，也就是臺灣人是否是中國人的議論。

對此，筆者亦曾提出「政治的臺灣人，文化的中國人」的另類選擇，應該比較貼近臺灣人民的心聲與認同，此乃可由上述政治大學學生的問卷結果得到證明。至於當前臺灣認同的根本問題，則還繫於兩岸關係的發展。目前，兩岸朝向和平發展的機率大增，若發展順利，雙方趨於融合，日後，政治的臺灣人變為政治的中國人的可能性不得排除，臺灣文化亦將融入中華文化。反之，文化的中國人亦將變為文化的臺灣人，中華文化亦將成為臺灣文化的一部分。

對於兩岸關係，當時民進黨主張以民粹式臺灣主體意識超越一切的觀點，讓臺灣到處碰壁，內政與外交不進反退。因而筆者亦曾主張以「身在臺灣、心繫大陸、放眼世界」等三個層面來面對，應可窺其全貌，掌控全局。當前兩岸的機遇千載難逢，若能適時把

握，前景應該看好。

但在比利時方面，由於法語與荷語之間的差異性甚大，兩大語言族群之間在長期的語言戰爭之後，才日漸找出了相處之道。因而可說，在聯邦的層面，雙語制已被接受，而在地方的層面，則還是堅持單語制。這對於國家的認同，並不能產生積極促進的作用，分離意識的傾向時常可見。這個情況導致兩大族群之間的齟齬不斷，好在雙方都已具備相當的鬥爭經驗，他們還是都會適可而止，但這始終都還是一個隱藏的分裂因素，而目前這就要靠兩大族群之間勢力的消長來決定了。

邀稿：99年08月02日

作者簡介

湯紹成博士，德國波昂大學政治學博士；研究領域：德國問題、歐盟外交、兩岸關係；曾任國民大會代表；現為政大國關中心副研究員。

